

養浩堂詩序

余五讀少陵懷謫仙詩口何
時一尊酒主典細論文未嘗不
歎良朋聚首者人世不易得之
事也夫文字之交其味相同詩
一有則六賞得一疑則共析此
之親戚之情詒骨肉之團聚其
樂自甚焉者然而此樂亦不數
觀也今之人抗心希古長吟遠慕
每懷與古人並肩同時既同時矣
而兩地投函一秦一越終身不
相聞不知誰某者客亦自之即
牽而敘此繡文而謂北香樹江
東暮雲惜別悵離不得相見

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

郭真義 鄭海麟 編著

養浩堂詩序

余五讀少陵懷謫仙詩曰何
時一尊酒主典細論之未嘗不
歎良朋聚首者人此不易得之
事也夫文字之交其味相同得
一有則六賞得一疑則共析比
之親戚之情訪骨肉之團聚其
樂自甚焉者然此樂亦不數
觀也今之人抗心希古長吟遠慕
每恨與古人生不同時既同時矣
而兩地睽隔一秦一越終身不
相聞不知誰某者客亦有之即
幸而彼此締交而渭北春樹江
東暮雲惜別悵離不得相見

籍漢人日批題遵黃

郭真義 鄭海麟 編著

G256.4
H927

G256.4

11927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郭真义,郑海麟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8

ISBN 978 - 7 - 101 - 06803 - 0

I. 黄… II. ①郭…②郑… III. 黄遵宪(1848~1905) - 序跋 - 选集 IV. G2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9330号

-
- 书 名 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
编 著 者 郭真义 郑海麟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8月北京第1版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¼ 插页2 字数16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803 - 0
定 价 28.00元
-

例 言

(一)编者出于开展黄遵宪研究之动机编撰本书,主要辑录黄遵宪对日人汉籍之题批。黄氏所题批的相关文本中其他人士之意见,适当选择录于后,以期读者能参酌互见。

(二)黄遵宪批评日人汉文,大多从文章的思想观点着眼,本书为免过于累赘而喧宾夺主,对相关的日人汉文文本,只概括其大意,指出黄遵宪批评之根由,未将原文本录出。黄遵宪批评日人汉诗,多从艺术上着笔,为使读者对批语有直观之感受,亦因为诗作篇幅相对较短,故对相关的日人汉诗大多录出。

(三)本书只着眼于黄氏题批之史料价值,故除必要之说明外,不附加编者之议论。

(四)本书编写所依据之日人汉籍,绝大部分是郑海麟博士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近代史研究室、日本东洋文库近代史研究室等单位从事研究工作时搜罗所得。本书编排之体例,依黄遵宪撰写批评之时间先后为序。

(五)本书所依据之文本及批语均无标点与分段,书中标点及段落为编者所加,错漏之处,有待方家指正。

(六)相关的日人汉籍及黄氏等人的批评中,常涉及日本历史掌故,虽已尽量注释说明,但因编著者所掌握的日本史知识有限,故仍有一些地方未能对文本内容及黄氏等人批评的由来作清楚的解释,祈望读者见谅。

日人汉籍中的黄遵宪题批述评(代前言)

郭真义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郑海麟博士,将其在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东洋文库等单位从事研究工作时苦心搜罗的大批经黄遵宪等人批评的日人汉籍,赠予嘉应学院黄遵宪与客籍作家研究所,使笔者有幸得见这些尘封已久的珍贵文献。展卷之余,惊喜异常。其中记录的众多黄遵宪的文字,多不为学界所认知者。这些史料对于进一步开展黄遵宪研究和近代中日交流史研究,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亦可作《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之补充。于是,笔者夜以继日,不忍释卷。一边阅读,一边断句标点,查核典实。虽然笔者为学识所囿,对其中的有些典故不甚了了,但急于将这些文献公诸同好的心情难以抑制,其中不完备之处,惟有待将来增补了。

日人汉籍中的黄遵宪序跋和批语,内容包罗万象,难以全面概括述评,笔者仅将个人阅读的点滴心得,汇成此文,以代前言。

一、日本汉学界的比附夸示之风与黄氏之批评

黄遵宪故居仍存有大量黄氏生前藏书,笔者曾将这些藏书都

翻看过一遍,试图从中找到一些黄遵宪的文字,但很可惜,这些藏书均洁净异常,除了断句符号,未留下任何黄氏之文字。可见黄氏阅读,并无在书中批注文字的习惯。但郑博士所赠的这批文献,却载有大量黄氏批语。除了黄氏之外,何如璋、沈文荧、王韬等大量晚清名流的批语亦在其中,还有大量日本汉学名家之批评。题批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日人汉籍的这一特点,与日本汉学界长期以来的比附夸示之风密切相关。

关义臣在其《日本名家经史论存》的《例言》中,介绍了其著作中黄氏等人评语的来由,这段自白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日本汉学界的比附夸示之风:

汉土本工于文章,邦人效焉为之。而中经兵革,文学久废,虽名贤宿儒,犹时有疵纇。当时诸家,亦欲就正汉人。但航禁方严,海外绝交,适有一二舶商,稍解文字,获其批评,欣喜不已。前辈之虚怀求益如此。方今两国往来,公使以下,驻扎累岁,其人官硕学,乞之批评,以就删正,盖亦前辈之意也^①。

宫岛诚一郎在其《养浩堂诗集》的《例言》中,亦介绍了诗集中黄氏等人批语的由来,揭示了日本汉学界的比附夸示风气,其中曰:

吾邦古来,刊诗文者多矣。而经汉儒选正者不多有。昔高旻谷自负才名,邮商舶赠诗于沈归愚,得其伪评。生平夸示于人,以为前人之所不及。今邻交益亲,使节互相来往,乃能

^①关义臣《日本名家经史论存·例言》,温故堂藏版,日本明治戊寅十月。

亲承诗教于清国诸儒,吾才固不逮古人,然窃自幸也^①。

日本汉学界这种比附汉土名流以夸示同仁之风由来日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汉学三百年来的这种风气有尖锐的批评。他说:

(日本汉学)既各持其说,无以相胜,则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袞^②。

可见,日本汉学界一直存在一种以得到汉土人士肯定为荣的风气,阅读而无批注习惯的黄遵宪在日人汉籍中留下的如此众多的批语,便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这就使得这些黄氏序跋批语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应景的色彩,这是我们在阅读把握这些文字时应注意的。

综观本书所及的黄氏序跋批语,笔者的直观感受是,黄氏对日人汉诗文的评价视角和标准是有差异的。《日本八大家文读本》和《日本名家经史论存》这两部书的批语,较为客观,黄氏在其中常有毫不客气的批评。例如:

评室直清《刘向论》语:

文章义理,两无可取,删之可也。(见本书第33页)

评室直清《扬雄论》语:

所谓应声虫,删之可也。(见本书第35页)

评物茂卿《学则》语:

①官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例言》,万安文库藏版,明治壬午年版。

②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之《学术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刻意摹子，理浮而气散，删之可也。（见本书第46页）

评冢田虎《劝学解》语：

平铺直叙而无剪裁，且多冗长拖沓之处，不选可也。（见本书第46页）

评蔡谔《六国论》语：

老生常谈。（见本书第28页）

上列文章的作者均为日本汉学名儒，在日本，“国人无不知其名，三百年来古文家之领袖也”^①。编者将这些文章选入集中，说明对其评价是较高的，但黄遵宪之批评可以说是不假辞色。这大概是由于文章的作者均已作古，与黄遵宪并无私人交谊，故黄氏批评起来没有顾忌，敢尽言其所欲言。

相反，对其他明治初期汉学家的诗文作品，黄氏的批语则多为肯定之辞，还常将其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等相比。即或是与黄氏关系特别熟络的宫岛诚一郎，黄氏对其《养浩堂诗集》诗稿的删削可以不假辞色，但序跋批语中，则多是肯定之语。这点，读者稍加浏览其序跋批语，就会有明显感受。平心而论，日人汉诗、汉文，与我国诗文大家之作相比，悬若霄壤。黄氏的序跋批语中的这些评价，是明显的溢美之辞。即或有指出其中之不足，亦太多言辞委婉。显然，黄遵宪在批评这些人之作品时，其序跋批语则多有溢美，盖因这些汉学家皆为黄氏之友人，黄氏虽鄙视日本汉学比附夸示之风，但仍不免应景客套，难以免俗。因此，我们对待黄氏这一部分序跋评语时，应稍加留意。

^①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注，钱仲联《入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二、从黄氏题批看其学术思想

黄遵宪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认为周公“其道在优柔和顺,以教民服从为主义”,是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源头。老子则“于学术首倡反对者”,“有破坏而无建设”。墨子“乃尽反周道,别立一宗矣”。管子则是“于政治首立异说者”,“多补苴而少更革”^①。在黄氏看来,上述四人的思想,局限性均是显而易见的,而让黄遵宪推崇备至的,则是孔子。

日人汉籍中的黄遵宪批语,多次谈及其对孔子的理解。例如批安井息轩《性论》:

圣人之言,至中且庸,所谓愚夫妇可以与知与能。而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孟子所言,往往高远,然其意欲激世砺俗,所以为大贤。宋儒之言,又高远焉,有必非愚夫妇可与知与能者。(安井氏)文中谓宋儒求孟子大过,末谓性必源于教,验诸乡人所能为,皆学问有得之言。(见本书第26页)

批古贺朴《曹参论》:

唯孔子所言,为万世可法而无弊。末流不知,指宋人之空谈,唐人之小诗,而曰“汉学”。是犹陈红腐之粟,以为不可食,而遂欲废五谷也。

孔子有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孔子又言:“时中。”治

^①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四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国之道，在审其时而张弛之而已。（见本书第31页）

批冈千仞《复鵬目生书》：

圣贤学问，一一皆归实际，可见诸施行。宋明诸儒之学，为儒家旁门别派，存其说可也，深信之，真有坏学术而误家国者，今其效既略可睹矣。（见本书第189页）

类似的尊孔言论，在黄氏与日人笔谈中亦有充分的反映，例如，他在与日本友人龟谷省轩、冈千仞等人笔谈时说：

孔子大成之圣，实为上下十二万年，纵横七万馀里，不能再有之人。其教人无所不备，不止《诗》、《书》、《六艺》已也。宋儒之学，为孔门别支，推其极不过学孟子耳，彼不知圣人为何等人也^①。

事实上，黄遵宪在早年诗作《感怀》中，就表达了这种对孔子的尊崇：

大哉圣人道，百家尽囊括，至德如渊骞，尚未一间达。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毕生事钻仰，所虑吾才竭^②。

更系统完整地表现黄遵宪对孔子思想认识的文字，则是在其晚年致梁启超的书信中。例如，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致梁启超书有云：

①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光绪六年三月一日，1880年4月9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②黄遵宪《感怀》，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报中近作,时于孔教有微词,其精要之语,谓上天下泽之言,扶阳抑阴之义,乃为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者,借口以行其压制之术。此实协无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虽然,儒教不过九流之一,以是诟儒,儒无可辞,惟孔子实不当以儒教限之。(刘歆《七略》列儒者于九流中,实为允当,其以六艺为九流公共之业,汉初学派则然,亦据实之词,惟不能出孔子于儒教之外,此则未悉源流无此卓识也。)举世界各教主而诘短较长,孔子无专长,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其圣在时中。所以时中,在能用权;所以能权,在无适无莫,毋固毋我。无论何教,欲挾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挾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吾欲著一书,曰《演孔》,以明此义,他日当再与公论定也。(自汉以下,儒教独尊,实以忠孝之故。然孟子于君臣专论施报,不言忠君;孔子言忠君,有礼有义,有分有制;不如汉、宋诸儒所云云也,彼所云云者,诬孔子也。吾独疑孔、孟推尊孝字,逾其分量,颇受他教以疵议之端。吾反复思之,孔、孟之意,或者据乱世重孝,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耶。太平世乃不必重孝,所谓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耶。公谓何如?苏子由有言曰:曾闵孝在二人,文王仁及天下,孝安能比仁?儒者敢为此言者,只此而已。)儒教可议者尚多,公见之所及,昌言排击之,无害也。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孟子于儒时有出入,孔子后一人而已。)惟仲尼日月无得而毁,请公慎之^①。

又如,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四日致梁启超书中有云:

自周以后始有儒称,实成周时庠序中教师之名耳。(《周礼·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曰:“儒,诸侯保民有六艺以教民者。”又

^①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三),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大司徒》曰：“联师儒。”注曰：“师儒，教以道艺者。”）其道在优柔和顺，以教民服从为主义，是周公创垂之教也。（《礼记·儒行》释文：“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说文》：“儒，柔也。”《广雅释詁》：“儒，柔也。”《素问》名曰：“枢儒”，注：“儒，顺也。”是皆历世相传之古训。甚至《广雅释詁》：“一儒愚也。”《荀子·修身》“偷儒”注：儒，谓“懦弱畏事”。《礼记·玉藻》：“儒者所畏”注：“儒，弱也。”则儒字益不堪问矣！）若我孔子，则综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术限。（儒乃孔子之履历，非孔子之道术，汉儒亦多未明白。然汉以前训诂家，尚无以儒为孔子道者。惟《淮南子·俶真训》：“儒墨乃始列道而议。”高诱注：“儒，谓孔子道。”然此注乃专为此语而发，非通论也。闻南海有儒为孔子所建国号之语。是亦见释迦之创佛教，耶稣之创天主教，摩诃末之创回教，误以为儒教亦孔子所创也。）世以周、孔并称，误矣！误矣！公之《变迁论》以南北分学派，以空间说（此论不甚确，盖论地理而证以学派则可，论学派而系以地理则窒碍多矣）。仆之此论，由周初以逮战国，以时间说。公谓此有当于万一否？幸纠正之^①。

综合上述黄氏的尊孔言论，我们可以归纳出黄遵宪对于孔学的理解：

首先，黄氏认为，孔学是权变时中之学。所谓时中，即审时度势，依时势变化而权变，以求其和。上述黄氏尊孔言论中，所谓“圣人之言，至中且庸”；所谓“孔子有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孔子又言：时中。治国之道，在审其时而张弛之而已”；所谓“吾胸中有一孔子，其圣在时中。所以时中，在能用权；所以能权，在无适无莫”等等，都在强调孔学中权变时中的理性精神。黄氏认为这是孔子

^①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四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思想的核心。

其次,黄氏认为,孔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前述黄氏尊孔言论中,所谓“圣贤学问,一一皆归实际,可见诸施行”,所谓“愚夫妇可以与知与能”,都在强调孔子的经世本质。正因为黄氏认为孔学是一种经世之学,所以他虽然尊孔,却反对将孔学尊为孔教。

再次,黄氏认为,孔学是囊括百家之学。既然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权变时中、趋时通变,那么,其思想便不是偏执一端的一家之言,而是“综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术限”,是“百家尽囊括”的。所以,黄遵宪自信地表示:“无论何教,欲挟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挟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

其四,黄氏认为,孔学是万世可法之学。既然孔子之学的核心是趋时通变,其便不存在适时性的问题,而是“万世可法而无弊”。

因此,黄氏认为,孔子与周公、孟子及后世所谓儒学是有本质区别的。周公是“以教民服从为主义”,与孔子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反对周孔并称。“孟子所言,往往高远”不像孔子之言一一皆归实际,黄遵宪大概也不太赞成孔孟并称。至于后世诸儒,在黄遵宪看来,是“儒家旁门别派”,为“孔门别支”,“推其极不过学孟子耳,彼不知圣人何等人也”。所以,对后世诸儒的学说,“存其说可也,深信之,真有坏学术而误家国者。”

黄遵宪对孔学的理解与认识是与众不同的,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这种对孔学的独特理解和认识,亦成为其一生言行的指导,这点下文还将述及。

今天回顾中国学术发展史,“孔学”与传统儒学确实有很大区别。所谓“孔学”,特指孔子本人关于他的思想、道德和伦理学说的

申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论语》中。所谓“儒学”,其概括自始就比“孔学”宽泛,经过孔子之后诸儒的演绎解说,与原本孔子的思想之间已有很大的区别。但黄遵宪作为一个晚清士大夫,在当时的时空里,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确实难能可贵。

三、从黄氏题批看其眼中的日本汉学家

从整体上而言,黄遵宪对日本汉学界没有太多的肯定,相反,更多的是给予尖锐的批评,这在其《日本国志》之《学术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黄遵宪说:

三百年来,国家太平,优游无事,士大夫每立一义,创一说,则别树一帜,如宋明人聚徒讲学之风,为之党徒者若蚁慕膻,以千百计,及其党羽已盛,名望已成,则王公贵人,列藩侯伯,争贡束帛,馈兼金,或自称门下,或冀得其尺牍手书以为荣。其上者拔之草茅,命参机密;其次者广借声誉,亦得温饱。而此徒彼党,往往负气不相下,各著书说,昌言排击。即共居一门,亦有同室操戈,兄弟阋墙以相狎侮者。甚则师弟之间反颜相向。或隙末而削籍,或师死而背去,又比比然也。既各持其说,无以相胜,则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袞。而朝鲜信使偶一来聘,又东西奔走,求一接謦欬,以证其所学之精。其骛声气,好排挤,日本之习汉学其弊有如此者^①。

^①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之《学术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这是黄遵宪对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汉学现状的细致描述。黄遵宪对日本汉学界拉帮结派,标新立异,负气争胜,浮夸趋利的风气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对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汉学现状,黄遵宪亦作了介绍:

维新以来,广事外交,日重西法,于是斥汉学为无用,有昌言废之者。虽当路诸公知其不可,而汉学之士多潦倒摈弃,卒不得志。明治十二三年,西说益盛,朝廷又念汉学有益于世道,有益于风俗,于时有倡斯文会者,专以崇汉学为主。开会之日,亲王大臣咸与其席,来会者凡数千云^①。

黄遵宪虽然对日本汉学的现状强烈不满,但这并不妨碍其对某些日本汉学家个体的肯定。本书涉及的日人汉诗文中,其作者包括明治以前的日本汉学前辈和明治初期的黄氏日本友人。虽然黄遵宪没有对某个日本汉学家作过系统的评价,但从黄氏对他们作品的批评之语中,我们仍可大概窥探到其对日本汉学家个体的不同态度。

在石川鸿斋所编的《日本八大家文读本》和关义臣所编的《日本名家经史论存》中,黄遵宪有过批评的文章共有四十四篇,涉及二十位日本汉学家。他们分别是德川中期(1680—1716年)、德川后期(1716—1845年)和德川末期(1845—1867年)的日本著名汉学者,他们的名字,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大都有所提及。

对于德川中期的日本汉学家,黄遵宪大多无好的评价,他认为

^①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之《学术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室直清的《刘向论》“文章义理，两无可取，删之可也”。（见本书第33页）其另一篇《扬雄论》亦给予“所谓应声虫，删之可也”的评语。（见本书第35页）他批评物茂卿的《学则》“刻意摹子，理浮而气散，删之可也”。（见本书第46页）他批评伊藤维桢《论诸葛孔明非王佐之才》“论王道甚谬，可删”。（见本书第36页）

被黄遵宪全盘否定的文章，均是德川中期的汉学名流之文，而他们又往往是日本影响最大、门徒众多的。他们在日本是最受推崇的日本汉学的开创者。但越是大名鼎鼎，黄遵宪对他们的否定越彻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日本汉学家，不论是习程朱学的室直清，还是习阳明学的物茂卿、伊藤维桢，均大多盲目崇拜汉土，缺乏权变时中的理性创新精神。而他们所习之学，在黄遵宪看来，又是“坏学术误家国”的、不可深信的儒家旁门别派。当然，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一个汉土名流在日本汉学面前的高傲与自负。

德川后期的日本汉学名流，黄遵宪在批评他们的文章时，大多有赞有弹。这大概因为这一时期日本汉学已由摹拟汉土进入到了一个自创学说的阶段。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汉学家，最受黄遵宪肯定的，是赖山阳。在黄遵宪的序跋批语中，时常流露出对此人的赞赏。例如：

批赖山阳《上乐翁公书》：

步武老成，不让古人。山阳天姿卓绝，惜学力未至，加以酝酿，不难摩魏叔子之垒，升苏长公之堂。（见本书第4页）

批赖山阳《平氏跋》：

文章精妙，几如听优人平语，弦管迭奏，时时入人心脾。